

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

白新良著



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

白新良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唐宋元明清各代书院建置沿革作了系统介绍，并对历代书院盛衰原因、过程、内部结构、书院与科举关系、学风演变、书院与官学关系、明清时期书院取代官学的过程以及清末废除书院为学堂的历史过程等重要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津) 新登字 012 号

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

白新良 著

*

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大学内)

邮编: 300072

天津市宝坻县第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5/8 字数: 250 千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618-0745-7

K.31 定价: 10.00 元

前 言

唐宋以后，随着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机构，书院开始兴起并逐渐趋于繁荣。明清时期，又得到更大发展并逐渐取代各级官学而成为地方教育中的一种主要机构。清朝末年，随着社会制度的剧烈变革，这种教育制度虽因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被废止，但是从其出现到废止，历时千年以上，而且在地域分布上也遍及全国各个角落，对于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无疑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即先后从各个角度对书院加以研究，对于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和学术文化发展规律，总结古代文化遗产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有关史料零碎分散，兼之以当时载录清代尤其是清末各地书院情况的大量地方志尚未刊印行世，因而，无论就总体、抑或就具体问题而言，研究仍然有待深入。为此，笔者不揣陋陋，历时数年，以地方志为中心，普阅各种古籍近三千种，将有关书院史料一一钩出，并删除重复，补充异名，订正讹误，又复将之分朝分省按年编排，从而对各代书院建置沿革有了一个概然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又对历代书院盛衰原因、过程、内部结构、各代书院与科举关系、学风演变、书院和官学关系、明清时期书院取代官学的过程以及清末废书院为学堂的历史过程等重要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从而成此《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一书，以就正于学术界同仁。

目前，我国教育体制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如果拙著能在对前人研究有所深化的同时，还能对建设我国现代教育体制起到一些参考作用，笔者将感到不胜欣喜。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就其中一些问题分别与南开大学历史

研究所南炳文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戎笙先生、南开大学历史系刘泽华先生、陈振江先生、朱凤瀚先生往复商榷并得到了他们的不少帮助，其中，朱凤瀚先生还将家中累世珍藏有关书院的罕见抄本古籍长期借示。值此书稿付梓之日，谨向他们表示深忱的谢意。

白新良

一九九四年四月于
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目 录

第一章 唐至元朝书院的兴起和发展	1
第一节 唐五代时期书院的萌芽	1
第二节 北宋时期书院的初步发展	4
第三节 南宋时期书院的繁荣	10
第四节 元朝时期书院的曲折发展	27
第二章 明朝时期书院的全面发展	55
第一节 明初书院的凋敝和初步发展	55
第二节 明朝中叶书院的普及	69
第三节 明朝后期书院的继续发展和衰落	92
第三章 清初书院的恢复	122
第一节 清初书院的凋敝	122
第二节 康熙时期书院的恢复和发展	126
第三节 清初书院学风的转变和名师讲学活动	142
第四章 清朝中期书院的兴盛	156
第一节 雍正时期书院政策的转变	156
第二节 乾隆时期的书院政策	165
第三节 乾隆时期全国书院情况	172
第四节 乾隆时期的书院特点及名师讲学活动	192
第五章 清朝后期书院的衰落	202
第一节 嘉道咸时期不同类型的书院	202
第二节 清朝后期书院的腐败和衰落	211
第三节 嘉道咸时期新建和修复前代书院	217
第六章 清末书院的短暂复兴和最后废止	235
第一节 同光时期书院的短暂复兴	235

第二节 同光时期的书院特点	249
第三节 戊戌变法和书院的最后废止	257
附录	279

第一章 唐至元朝书院的兴起和发展

第一节 唐五代时期书院的萌芽

书院之名，始于唐朝中期^[1]。最初，使用这一名称的是官方学术机构。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五年，唐朝政府组织文人于乾元殿校理经籍。为此，遂将乾元殿更名丽正修书院。随着这一活动的开展，又先后于国都长安皇宫光顺门外以及东部洛阳明福门外均置丽正书院。十三年，又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作为一个官方学术机构，书院最初的任务只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供皇帝选用和参考，和后来意义上的书院根本不同。但是，在文化空前发展的唐代，这一官方学术机构的出现，却对当时的官僚、文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书院是中央政府中秘图书收藏之处，坟籍无所不备；而在皇帝身边以备侍从顾问又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为了夸耀乡里，一些文人在致仕返里之后便也将自己藏书治学之处称为书院。如开元年间曾任集贤院学士的徐安贞即于返回浙江龙游原籍之后建九峰书院^[2]。这样以来，书院就由官方学术机构变成了私人藏书治学机构的名称。本来，汉朝以后，私人治学、授徒之地一直称为精舍、精庐。南北朝以后，佛教大盛。不少佛教经师也将自己传经授徒之处混称精舍、精庐，以致僧俗不分，不少正统儒生对此极觉头疼。因而，当时这种以书院命名的私人藏书、治学机构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广大反对佞佛的官员和士人的欢迎。这样，自八世纪下半叶开始，至唐朝灭亡一个半世纪的时期中，先后建立之书院不下 30 多所。其中，见于《全唐诗》诗题者有 11 所。它们是：李秘书院、第四郎新修书院、赵氏昆季书

院、杜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李群玉书院、田将军书院、子侄书院、沈彬进士书院^[3]。另据各种古籍及地方志记载，属于唐朝建立的书院还有 25 所。它们是：

河南洛阳丽正书院，开元十二年置，十三年改集贤殿修书院。

浙江会稽丽正书院，开元十一年建。

广东始兴文献公书院，开元间建。

浙江龙游九峰书院，开元间集贤殿学士徐安贞读书处。

湖南衡山明道书院，唐李泌子李繫建。

江西高安桂岩书院，唐贞元进士、国子祭酒幸南容建。

四川遂宁张九宗书院，唐贞元间建。

四川大渡河海棠池书院，唐贞元间节度使韦皋建。

江西九江景星书院，唐元和间江州刺史李渤建。

江西德安李渤书院，唐长庆间江州刺史李渤建。

广东阳山尊韩书院，唐韩愈读书处。

福建漳浦梁山书院，唐元和进士潘存实读书处。

湖南衡阳石鼓（李秀才）书院，唐元和中士人李宽读书处。

湖南衡山韦宙书院，唐宣宗时岭南节度使韦宙建。

湖南澧洲文山书院，唐宣宗时李群玉读书处。

福建福鼎草堂书院，唐乾符进士林嵩读书处。

浙江寿昌青山书院，唐僖宗时隐士翁洮建。

江西德安东佳书院，唐义门陈袞建，一名义门书院。

江西永丰皇寮书院，唐吉州通判刘庆霖流寓永丰，建以讲学。

福建福清闻读书院，唐水部郎中陈灿读书于此。

福建漳州松洲书院，唐陈珣与士民讲学处。

福建建阳鳌峰书院，唐尚书熊秘建。

湖南衡山卢藩书院，唐隐士卢藩建。

湖南耒阳杜陵书院，唐建。

陕西兰田瀛州书院，唐瀛州学士李元通建^[4]。

扣除与《全唐诗》重复的李宽中秀才书院和李群玉书院，两者相加，见之于文献记载的唐代书院实有 34 所。如果考虑到由于时代久远，史料湮没，有些唐建书院已经湮没无闻，以及宋元以后各种史籍、方志关于唐代书院的记载或有依托，两相抵消，这一数字大致可信。另外，对有关上述各书院史料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上引《全唐诗》作者以及各种方志中所载唐代书院始建人生活时代皆在开元以后，可证我们关于书院之称始于唐代中期以后的推断大致合乎历史事实。同时还可看出：一是这些书院除极个别者外，皆是私立；建立者身分，大多是文人、致仕官吏于原籍所建。建立书院之目的，多是为个人藏修治学；书院存在时间，一般皆与始建人活动年代相终始。所有这些，都是书院尚处于萌芽时期的标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一，这时个别书院已兼有教学职能。如江西永丰皇寮书院，系吉州通判刘庆霖“流寓永丰，建以讲学”^[5]。唐义门陈衮所建之江西德安东佳书院，也“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6]。福建漳州松洲书院，为唐陈珙与士民讲学处^[7]。其二，现任地方官吏于任所建立书院也已出现。如贞元间岭南节度使韦皋所建之大渡河海棠池书院。尽管这些在当时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却对后世书院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代时期，政局混乱，战争连年，文化教育事业也遭到严重破坏。受此影响，处于萌芽之中的书院数量较之唐代明显减少。据统计，这一时期所建书院只有 4 所。它们是：河南登封太乙（后名太室、嵩阳）书院（后周末）、江西奉新梧桐书院、江西泰和匡山书院（南唐间）和广东连州天衢书院。其中，除河南登封太乙书院因史料缺乏无法了解其详细情况外，其余 3 所书院都转以教学为主要目的。如泰和匡山书院，系长兴间南唐里人罗韬所

建,“以讲所学”^[8]。与此同时,罗靖、罗简兄弟亦于奉新建梧桐书院,进行讲学^[9]。连州天衢书院,亦是时人黄损肄业之处^[10]。可见,正是由于战争破坏,官学废弛,才使书院的教育职能进一步增长,从而为其完成向教学与学术研究机构的过渡准备了条件。总之,作为书院的萌芽时期,尽管当时书院数量颇少,而且存在时间短暂,内部结构也多不健全,但是在不长时间里,即完成了由官方学术机构向私立学术机构的转变,与此同时,其教学职能也有了明显的增长。就此而言,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唐五代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

第二节 北宋时期书院的初步发展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中国古代书院进入了它的初步发展时期。

北宋时期新建书院数量,据前人统计,只有 37 所^[11]。而据笔者统计,可以明定为北宋所建者已有七十一所。兹据各种地方志所载,将之按省摘录如下:

直隶 3 所:元氏封龙书院、元氏西溪书院、元氏中溪书院。

河南 5 所:商邱应天书院(大中祥符二年)、登封颖谷书院(崇宁间)、嵩阳和乐书院、洛阳同文书院、上蔡显道书院。

陕西 1 所:肤施嘉岭书院(康定间)。

山西 1 所:长治雄山书院(靖康间)。

山东 4 所:泰安泰山书院、益都白龙洞书院、莒州文学书院、郛城岳麓书院。

江苏 4 所:金坛茅山书院(真宗朝)、无锡龟山(东林)书院(徽宗朝)、华亭九峰书院、如皋王俊义书院。

浙江 4 所:寿昌默山书院、建德龙山书院、永嘉东山书院

(仁宗朝)、宁波桃源书院(神宗朝)。

福建 3 所: 侯官古灵书院(神宗朝)、政和星溪书院、政和云根书院(政和间)。

江西 23 所: 庐陵光禄书院(开宝二年)、星子白鹿洞书院(太祖朝)、奉新华林书院(雍熙间)、新建秀溪书院、新建香滨(香溪)书院、乐安慈竹书院(太宗朝)、南城盱江书院、新城凤月书院、宜黄鹿冈书院、安义社平书院、义宁樱桃书院、(仁宗朝)、义宁濂山(濂溪)书院、萍乡宗濂书院、赣县清溪书院、义宁徐氏书院、泸溪进修书院(神宗朝)、安义秀峰书院、安义招贤书院、临川兴鲁书院、新昌义方书院(哲宗朝)、弋阳碧落洞天书院(徽宗朝)、宜黄定庵书院(钦宗朝)、宜黄宗文书院。

安徽 4 所: 颍州西湖书院(皇佑间)、南陵黉堂(元功)书院(熙宁间)、休宁柳溪书院(绍圣间)、休宁秀山书院(崇宁间)。

湖北 3 所: 嘉鱼义学书院(庆历间)、荆门东山书院、咸宁相山书院。

湖南 8 所: 长沙岳麓书院(开宝九年)、长沙湘西书院(咸平间)、湘阴汨罗(清烈)书院(大中祥符间)、湘阴笙竹书院(天禧间)、衡山清献书院(神宗朝)、临武南薰书院(元佑间)、永明顾尚书书院(政和间)、兴宁观澜(醴泉)书院。

广东 4 所: 保昌孔林书院(建隆七年)、英德涵晖谷(涵晖)书院(景德间)、德庆州濂溪(三洲)书院(熙宁元年)、遂溪文明书院(元符三年)。

四川 4 所: 顺庆府果山书院、洪雅遗直书院(真宗朝)、盐亭太元书院(神宗朝)、富顺柳沟书院(徽宗朝)^[12]。

除此之外, 如果考虑到尚有 125 所不详南北两宋何时所建书院也有部分建于此时以及太宗至道年间还曾先后重修了登封太乙(太室、嵩阳)书院, 衡山石鼓(李秀才)书院, 那么, 北宋一

朝先后存在之书院当在百所左右，几乎相当于唐五代时期的3倍。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古代书院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既有它的一般原因，又有它的特殊的具体原因。就一般原因而言，北宋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就具体原因而言，一是因为五代以来，战乱频仍，官学普遍废弛。而在北宋初年，中央政府仍然忙于统一战争，没有余力兴办教育。士子如欲求学问道，只能依靠私人教育，从而使书院的兴起成为可能。二是自唐朝后期以来，军阀混战，武人专横跋扈，朝代更迭频繁。有鉴于此，为了巩固自己一家一姓的统治，宋初统治者极力对武臣加以裁抑，并为文人人仕大开绿灯。因而，自太祖时起，宋朝政府连年开科取士，不断增加科举录取名额。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官吏后备军，对于私人兴办书院，也取支持态度。赐书、赐扁、赐田、赐予官职皆史不绝书。其赐书者如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赐“印本九经”于江西白鹿洞书院^[13]。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赐登封太室书院“九经子史”^[14]。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赐“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于长沙岳麓书院^[15]。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赐太室书院九经”^[16]。八年（公元1015年），赐长沙岳麓书院中秘书^[17]。其赐额者如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为登封太乙书院赐名太室书院^[18]。真宗大中祥符中，为商邱应天书院书扁赐额^[19]。同时，又为长沙岳麓书院“因旧名赐额”^[20]。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为衡山石鼓书院书扁赐额^[21]。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为宁波桃源书院书扁赐额^[22]。其赐田者如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赐金坛茅山书院田3顷，“充书院贍用”^[23]。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给登封太室书院田1顷^[24]。同时，又赐衡山石鼓书院田5顷^[25]。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又赐登封太室书院田10顷^[26]。其赐官职者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96年），“官（白鹿）洞主明起为褒信县主簿”^[27]。真宗大中祥符

八年（公元1015年），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拭于便殿，“拜国子监主簿，使归教授”^[28]。北宋政府的这种积极态度，使得“书院之称闻于天下”，从而极大地刺激了书院的发展。三是北宋时期，封建社会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其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即是古文运动的深入和道学的兴起。其中，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等皆在文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以周、张、二程为代表人物的道学，作为理学的先驱，开始超出伦理范围，从更高的哲学层次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虽然由于最高统治者感觉迟钝，对其态度并不积极，但是因其对于维护封建统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兼之以这些代表人物皆淹通坟籍，学识渊博，识见深邃，品行敦厚，足堪为人师表，故而在其传播之始，即在思想、文化界各自拥有不少的信徒。因而，尽管北宋中期以后，由于政府多次兴学，官学渐趋完备，一些有名书院如江西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商邱应天书院等皆被强制改为官学，但是新建书院仍然不断出现。其由古文运动倡导者及其信徒所建之书院在仁宗朝有陕西肤施嘉岭书院（康定中）、安徽颍州西湖书院（皇佑中）、江西义宁樱桃书院、江西临川兴鲁书院、浙江建德龙山书院等，在哲宗朝则有广东遂溪文明书院（元符三年）等。其由道学代表人物及其信徒所建之书院计有山东泰安泰山书院、江苏无锡龟山（东林）书院、广东德庆州濂溪（三洲）书院、江西南城盱江书院、江西新城风月书院、江西义宁濂山（濂溪）书院、江西萍乡宗濂书院、江西赣县清溪书院等。所有这些，也都推动了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

北宋时期，不但书院数量较之唐五代时期成倍增长，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是教学职能普遍增长，二是书院内部结构也渐趋完备。据笔者统计，在71所北宋所建书院中，具有教学职能者不下21所，而以个人藏修为目的者只有10余所。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此时书院教学职能有了明显的增长。如直隶元氏封龙书院、元氏中溪书院为宋初学者李昉、张蟠

叟讲学之处^[29]。江西新建秀溪书院，为宋初学者邓晏建以讲学^[30]。浙江永嘉东山书院，为宋儒王儒志讲学处^[31]。江西南城盱江书院，为宋儒李觥教授之所^[32]。山东泰安泰山书院，为宋儒孙明复讲学处^[33]。江苏金坛茅山书院，为学者侯遗讲学处^[34]。湖南湘阴笙竹书院，系天禧中县人邓咸所建，“以训子弟及游学之士”^[35]。江西临川兴鲁书院，为曾巩所建，“以讲学”^[36]。江西义宁樱桃书院，为时人黄中理所建，“延四方学者，宋郊、宋祁并至焉”^[37]。安徽南陵黉堂书院，为宋熙宁中进士徐元功乞归后所建，“延师训乡子弟”^[38]。江西萍乡宗濂书院，为周敦颐监税之处，“立书院以教授”^[39]。江西义宁濂山（濂溪）书院，亦系周敦颐所建，“以延游学之士”^[40]。江苏无锡东林（龟山）书院，为学者杨时讲学处^[41]。至于以书院命名家塾者更比比皆是。在此同时，山长、生徒、斋舍、祭祀、藏书、田产等书院内部结构及成分也都渐趋完备。不少书院都设有山长，主持书院讲席。如张著曾任直隶元氏西溪书院、中溪书院山长^[42]。太平兴国年间，明起为江西白鹿洞书院洞主^[43]。真宗咸平中，周拭任长沙岳麓书院山长^[44]。大中祥符年间，以宋初名儒戚同文孙戚舜宾为应天书院山长^[45]。仁宗景佑间，王曾为河南登封嵩阳（太乙、太室）书院“奏置院长”^[46]。至于生徒，则凡有教学职能之书院无不有之，有的书院还因规模较大而生徒众多。如河南登封太室（嵩阳）书院，太宗至道中，“赐九经子史，置校官”之后，“生徒至数百人”^[47]。江西白鹿洞书院，北宋时期，“与睢阳、石鼓、岳麓并名天下，学徒常数百人”^[48]。咸平年间，长沙岳麓书院，生徒定额“六十余人”^[49]。皇佑间，王儒志设帐讲学之浙江永嘉东山书院，“席下常数百人”^[50]。因为前来就学人数甚多，一些有名书院建筑也颇为齐全。如长沙岳麓书院，自开宝年间朱洞始建时，即“作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咸平四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益崇大其规，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象，画七十二贤”^[51]。江西白鹿洞书院，亦于宋初建设基础上，“增学

舍”^[52]。河南商邱应天书院，初建时，即有斋舍 150 余间^[53]。著名学者李觏主讲之江西南城盱江书院，有明伦堂、洙泗堂及诚意、正心、致知、格物四斋^[54]。在此同时，受官学影响，一些书院也开始有了祭祀对象。如宋初所建之江西新建秀溪书院，“中设夫子位置，翼以颜曾思孟”^[55]。长沙岳麓书院，真宗咸平间，即“塑先贤十哲之象，画七十二贤”^[56]。同时，江西白鹿洞书院亦“修缮圣贤象”^[57]。此外，不少书院如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等还皆以政府赐书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藏书机构——书楼。河南商邱应天书院亦由创办者曹诚“聚书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58]。为了维持书院的日常开支，一些书院还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学田。其中，除政府曾经赐予江苏金坛茅山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湖南衡山石鼓书院田产之外，对一些史料加以分析，也可看出，其它不少书院也都有其经常性的收入。如江西白鹿洞书院，皇佑中，“四方来学者，并给廪饩”^[59]。其中一些书院还因生徒众多，规制健全，兼有名师讲学而成为一方学术中心。所有这些，说明北宋书院不但在数量上较之唐五代时期大有超越，而且也有了质的提高。

北宋时期，在内地书院不断发展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政权控制地区也有了自己的书院。据雍正《山西通志》所载，辽翰林学士邢抱朴曾于山西应州建龙首书院。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其详细情况，但是这一书院的建立，无疑对后来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书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时期，各地书院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除个别书院外，多数书院斋舍简陋，其他许多内部规制如招收生徒、考试制度、学习科目和师资聘请也多不健全。祭祀中，受官学影响颇深；除个别书院因政府赐田而有经常性经济收入外，多数书院没有固定经济收入，以致不能保持永久。而且，从整体上看，书院地位也还在官学之下。所有这些，都是书院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表现。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书院数量的增加和其教育职能的进

一步增长以及其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却表明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在教育事业中发挥愈来愈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南宋时期书院的繁荣

南宋时期，书院建设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潮。书院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广，都为前此所不及。与此同时，书院各种内部规制也愈加细密和完备，以致不少著名学者皆至书院讲学，有志学问道的士子也趋之若鹜，从而使得书院超出官学之上而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古代书院开始进入了它的成熟发展时期。

对于南宋时期的书院数量，学术界一直没有详细统计。笔者依据各种资料统计，总数当在 500 所以上。其一是南宋时期新建书院，计 299 所。它们是：

安徽 12 所：绩溪槐溪书院、无为州林泉书院、休宁西山书院（孝宗朝）、当涂采石书院（宁宗嘉定间）、歙县紫阳书院，当涂天门书院（理宗淳佑六年）、贵池八柱书院（八年）、当涂丹阳书院（景定五年）、泾县翠峰书院、六安州龙山书院、六安州武陟书院（理宗朝）、歙县西畴书院^[60]。

江苏 16 所：溧阳金渊书院（绍兴间）、上元南轩书院、阳湖城南书院、丹徒淮海书院、无锡遂初书院（淳熙间）、泰州胡公（安定）书院（宝庆二年）、武进龟山书院（绍定三年）、长洲和靖书院（端平二年）、吴县鹤山书院（三年）、上元明道书院（淳佑元年）、丹徒濂溪书院（宝佑间）、吴县学道书院（咸淳五年）、金坛龙山书院、泰兴马洲书院、昆山玉峰书院、金坛申义书院（度宗朝）^[61]。